

CHINA

China aus der
Sicht der Schweizer

走近中国

瑞士人在华见闻录

马 轶
〔瑞士〕 费 瑞 实 编
高 恩 曼
陈 壮 鹰 译

东方出版中心

CHINA

China aus der Sicht der Schweiz

2001
K250.6
43

>

走近中国

——瑞士在华经济观察

【瑞士】瑞士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编
瑞士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译

12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记录了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些瑞士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作者主要为商人、记者、教师和旅行家等，从西方人的独特视角反映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作品译自珍贵的德文版原著和私人档案，内容既有对北京、西安、上海等历史文化名城的观感印象，也有对基层单位、普通家庭的专访特写；有对旅途奇特经历的难忘回忆，更有对新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通过这些纪行散文，读者能较真切地感受到撰著者对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特殊情感；对了解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印象颇有裨益。

Zum Gedenken an das 50jährige Jubiläum der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Schweiz und China (1950 ~ 2000).

—— Der Schweizerische Bundespräsident



14. September 2000

谨以此书庆贺瑞士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交五十周年(1950 ~ 2000)。

—— 瑞士联邦主席
阿道夫·奥吉

2000年9月14日

CHINA

序

50年前,1950年1月17日,瑞士在国际上正式承认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同年9月14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庆祝瑞中建交50周年,今年将有两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一本是中国人访问瑞士时的所见所闻,时间跨度为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此书将在瑞士用德语出版;另一本则是您现在看到的《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记载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末瑞士人在中国的亲身经历。

据记载,早在17世纪末,瑞士钟表业者和商人就已经来到中国。他们回国后常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据说一个名叫博萨特的瑞士医生曾为饱受牙痛煎熬的康熙皇帝拔过牙!当然,我们很难确认传说里究竟含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本书所选的游记都是瑞士人在华的亲身见闻,以瑞士人、欧洲人的视角来描述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各篇文章的主题和描述对象也因作者的不同而各有侧重。

虽然本书描写的是中国,但其独特的视角仍然能带给中国读者以乐趣和启迪。书中描述的某些时代,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现在中国读者可以通过瑞士人的眼睛来回顾自己国家的历史。书中所选的各篇游记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走过的各个历史阶段,映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中国前进的巨大步伐。在阅读这些文章的同时,中国读者也能反过来了解瑞士作者们的兴趣、爱好、来华的目的和对事物的看法。作者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而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中国读者对瑞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我感到本书不仅内容精彩,而且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表现出瑞士人民对中国自始至终的好奇,对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和悠久文化的向往与友善。某些描述饱受战乱的旧中国的文章充满对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百姓的深深同情。某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到中国的瑞士人则用他们的笔,记录下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们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书中的文章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瑞士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全面,中国在瑞士人眼里不再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这也说明瑞中两国以及瑞中两国人民之间交往的重要作用。我很高兴地看到,随着瑞中两国交

往的日益紧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日渐加强。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本书的译者陈壮鹰博士。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而且还为本书的出版事宜付出了许多辛劳。我要感谢东方出版中心为本书的出版和印刷所做的大量工作。最后,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尤其是我的好朋友——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学院院长高思曼教授。正是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热情协助下,上述两本书才得以出版。

我相信,《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将进一步增进瑞士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添上一块薄瓦。祝所有的读者能与本书一起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瑞士驻上海总领事

伦志民 博士



CHINA

前 言

中瑞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可以溯源至 17 世纪。虽然瑞士联邦与中国在 17、18 世纪还没有直接的外交和经济往来,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业已开始。1618 年,传教士约翰·施莱克(1576~1630)动身前往中国。施莱克化名特伦蒂乌斯,在当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医生、哲学家兼数学家。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瑞士人。1621 年到达北京后,施莱克负责管理教会图书馆并受中国皇帝的委托着手改革中国的历制。1630 年他在北京去世,身后留下八部用中文撰写的关于机械、三角几何、天文、植物学方面的书。在他之后,还有另外一些瑞士传教士以及少数瑞士雇佣兵在 17 世纪相继来到中国。

钟表和音乐盒在 19 世纪以前的瑞中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教士和欧洲各国的外交使节常把钟表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官员,并且乐于为他们讲解其中的机械原理。这些钟表大部分来自欧洲的不同厂家,其中确有一部分来自瑞士。钟表和音乐盒为巩固欧洲传教士在当时中国朝廷的地位起了不小的

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

作用。有一位瑞士传教士因具有制表手艺而受到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的赏识:楚格州人弗兰茨·路德维希·施塔德林(1658~1740)为康熙建立宫廷钟表及天文仪器工场并管理该工场直至1740年去世。

19世纪初,瑞士与中国开始直接贸易往来,钟表是主要贸易商品。1815年以后瑞士西部地区的钟表工业经历一场危机。博维兄弟的出走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居住在纽沙泰尔州弗洛利尔地区的博维家族是钟表世家。1815年后,博维三兄弟移民英国。其中最小的弟弟爱德华·博维(1797~1849)于1818年来到广州,在一家英国贸易公司的办事处工作。1822年他和两个哥哥一起成立自己的钟表贸易公司。公司的生产基地设在弗洛利尔,英国分公司负责发货,广州有一个销售中心。短短几年时间,博维公司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钟表贸易公司。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期间,公司的业务也没有受到影响。

到19世纪末,瑞士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交易的商品首推钟表和丝绸。然而另一方面,瑞士传教士,尤其是巴塞尔布道团的在华活动也极大地促进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瑞中之间其他领域的交往。巴塞尔布道团于1847年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是第一个赴华的瑞士布道团。它的活动范围

集中在广东省,传教对象主要是当地居民。到19世纪末,巴塞尔布道团一共在中国建立11个分站。布道团的成员于1880年借助中文和拉丁文将圣经译成粤语。此外,布道团成员特奥·哈姆贝格在19世纪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历史、宗教、文化、语言和政治状况的著作。1920年前后,巴塞尔布道团在华一共拥有18个分站、两所医院以及一批中小学和神学校。

19世纪来到中国的并不仅仅限于瑞士传教士和商人,还有一些学者也慕名前往中国,如:瑞士地理协会主席阿图·德·克拉帕雷德、著名汉学家爱德华·让万等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哈特曼·海因里希·舒尔岑贝格(1832年前后出生),他于1850年以商人身份来到中国,在那儿最初从事鸦片贸易。1890年后他结识了李鸿章的养子李敬方,成为李敬方的私人顾问。而李敬方是李鸿章的左臂右膀。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舒尔岑贝格试图说服瑞士联邦总统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可惜没有成功。

瑞士政府虽然在19世纪没有与中国签署任何条约,但是它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获益不少。1913年10月7日,法国和德国正式承认年轻的中华民国,瑞士紧随其后也在同一天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然而瑞中之间并没有马上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也没有互派使节。直到1918年,瑞中两

国才在日本东京签订外交协议(1919年获瑞士国会批准)。1919年初,中国在瑞士设立公使馆。瑞士也于1921年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因为大多数在华瑞士人居住在上海。1922年瑞士驻广州领事馆开馆。除上海、广州以外,杭州、北平、天津等地也有小规模瑞士社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人在中国的活动没有受到干扰,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日本占领军的管理并在某些方面调整自己的行为,在上海的瑞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进入20世纪,瑞中两国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当然这种交往有时候也会受到某些外因的影响,如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期间来华旅游的瑞士人明显减少。瑞士于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同年9月14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欧洲非共产党国家中只有丹麦、芬兰和瑞典三个国家与瑞士一起在1950年跨出这一步。在此之后又过了整整20年,来华旅游访问的瑞士人、瑞士代表团才又逐渐多起来。

尽管如此,各种由瑞士人撰写的赴华旅游游记、散文还是为数不少。本书所选的文章时间跨度大约一百多年,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接触。

第一类文章的作者大多因为工作关系在中国生

活过一段时间。他们自由旅行,会中文的人还能与中国百姓直接交往。他们怀着对陌生国土的好奇打量中国、描述中国。商人阿道夫·克莱尔(1834~1900)在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后不久来到中国南方。他的描述客观清醒,不带任何历史偏见,但从文中不难看出一丝猎奇的心理。埃娜·马亚尔的文章同样承袭欧洲探险小说的传统。她与同伴一起穿越中国大西北,试图寻找西方物质文明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虽然一路上接触了不少传教士和当地军政官员,但是她没有把笔墨花在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身上,而是细致入微地描述她一路所见的风土人情。类似风格的文章还有雷纳·施耐尔(1926~)的家信。在中国内战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为一家瑞士公司的雇员一直生活在上海。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中国姑娘——后来成为他的妻子。这使他写给父母的家信更具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色彩。信中展示了他克服偏见和阻力试图通过这种关系接近中国的种种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疑虑。建筑师海蒂·温格尔和彼得·温格尔则通过与中国朋友的私人关系来走近中国。他们的观察以个人经历和主观印象为基础,常常浮想联翩。文章具有很强的印象主义风格。

小学教师乌里希·科尔布鲁纳写的中国游记则属于另一类。他在游历亚洲时曾到过中国香港和广

州。由于语言不通(他连英语也不会),他只能泛泛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很多地方借助导游手册和其他信息来源,其中不乏谬误和偏见,如他对荣誉领事的错误解释。贝蒂·加朗、马里奥·科尔特泽、弗兰克·阿·迈尔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访问中国的。他们用浪漫的笔调描绘中国:清晨,贝蒂·加朗在中国某个山村的一户农家醒来,远离社会文明,置身纯朴的家庭和农庄之中,四周一派优美的乡村田野景色。后来他试着甩开翻译和陪同,独自“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托运行李,买车票,却不得不最终放弃:中国是那么的神秘和不可接近。科尔特泽和迈尔笔下的中国同样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村落,有着雄伟的皇家宫殿;上海这座昔日的冒险家乐园则是一个西方化的港口城市。十年后保尔·厄尔尼怀着彻底了解中国的雄心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他当然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宏愿,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媒体的介绍。

记者莉丽·阿贝格(1901~1974)和马丁·赫利曼采撷的见闻录属于第三类文章。莉丽·阿贝格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重庆为《法兰克福报》工作,马丁·赫利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两次访问中国。五十年代中期,两位记者先后来到新中国。他们的文章充满着对逝去的旧日的伤感,而且不约而同地把这种怀旧感情寄托在黄包车夫身上。他们以新闻

工作者的敏锐,观察到许多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如:阿贝格注意到苏共二十届全会后,1956年5月1日北京挂起了大幅斯大林肖像。而赫利曼则发现1958年天安门上没有悬挂毛泽东画像。此外,两位记者还根据国际书店出售的图书预测政治气候的变化。

莉丽·阿贝格和马丁·赫利曼的文章保持着新闻采访的纪实性和评判性。埃娜·马亚尔的小说承袭传统殖民地冒险文学的衣钵。本书其余文章大多是有感而发的随笔,并不刻意追求某种文学形式。克莱尔的日记和施耐尔的家信根本不是为了出版而作,只是到了最近才被发掘整理出来。海蒂和彼得·温格尔的旅行诗也只是在朋友圈子里传阅。

许多瑞士人怀着梦想和憧憬踏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这时他们才发现一切与想象中的是那么地不同。有人说:“在中国呆过一星期的人回国后能写一本书,呆过一个月的人能写一篇文章,如果呆的时间更长些,那他什么都不会写。”

Robert H. Gassmann(高思曼)

Raoul D. Findeisen(冯 铁)

Thomas Froehlich(费瑞实)

CHINA